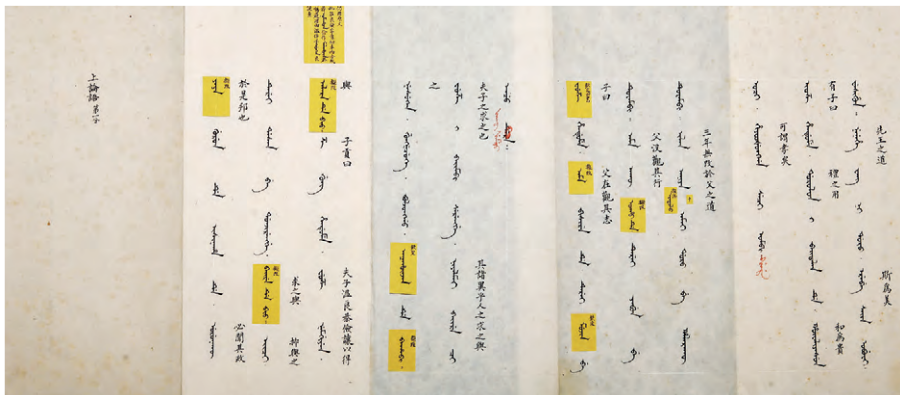




御批满汉合璧四书稿本（局部）

乾隆皇帝御批满文四书

文/徐莉

四书是儒家经典著作，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汉代以来，四书就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清入关之后，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也意识到儒家思想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作用，孔孟经书和程朱理学著作几乎全被译成满文。

满文四书版本众多。最早的满文译文可追溯到康熙朝，而后乾隆皇帝命儒臣重新厘定，形成了满汉合璧武英殿本《御制翻译四书》，对后来四书的满文译文影响深远。满文四书的诸多版本中，最独具特色的便是乾隆皇帝御批的满文四书稿本。

皇帝的必修课 士子的必考项

四书是清朝皇帝学习的必修课。我国古代皇帝学习的制度叫做“经筵”，是指汉唐以来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儒臣给皇帝上课，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

之道。宋代开始称作“经筵”。经筵制度为后代所沿袭。其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二是“以古证今”，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清代康熙十年（1671年）三月，举行经筵典礼，并使之制度化。康熙皇帝每日听政之后，就到弘德殿听讲，从不间断。其后各朝皇帝也都命儒臣进讲清文四书，成了清代皇帝的必修课。

满文四书同时也是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项。清代以满文为“国书”，称为“清字”。在继承了历代科举考试的同时，清代皇帝把本民族的语言加入到了科举之中，开始在科举设立翻译科。参加科举的士子们必考题目就有满文四书。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全宗汉文朱批奏折中有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初七日，刑部尚书来保奏折内称，按照科场条例的规定，翻译乡试和会试需要让士子们作清文一篇，请皇帝清文四书内命题。乾隆皇帝随

即在奏折上用红笔直接给出了满文题目：unenggi serengge, beyei muten; doro serengge, beyei yabun（以上是满文拉丁字母转写形式）。这个题目出自《中庸》第二十五章，汉文是：“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满语发展的必然 文化发展的趋势

满语在语言学上划分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文是拼音文字，其书写方式自上而下，自左而右。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授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仿照蒙古文创制满文。其字母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故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因属初创，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无论是学习，还是使用，均有诸多不便。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授命达海改进了“老满文”。经达海改进的满文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我们现在看到的满文文献多是用新满文书写的。满文从创制到清末使用时间经历300余年，留存下数量巨大的满文文献。

清朝入关后，作为国语的满语，大量吸收了汉语借词，无论机构名称、职官名称、书名等都用满文拼写，形成大量音译词汇。乾隆十二年（1747年）始，乾隆皇帝颁布上谕钦定“新清语”，从机构、职官的满文名称开始，把音译满文词汇全部订正为意译词汇、规范满文文字及用法，大大增加了满语词汇，丰富了满语的表达。

乾隆时期社会安定，文化昌盛，满族对于汉文化的融合和理解更为深入。清初翻译的汉文著作，无论是满文词汇的使用还是对文意的理解不足之处显现出来。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便命儒臣重新厘定满文四书，厘定好的满文四书陆续进呈，乾隆皇帝便用朱笔在进呈稿上对不妥之处进行修改，形成了御批本。

满文四书版本多 御批稿本具特色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满文四书以解义形式刊布，这就是给康熙皇帝上课

用的教材《日讲四书解义》。该本26卷，喇沙里、陈廷敬等撰，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内府刻本。此书根据日讲精解和经筵讲义整理而成。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半页7行，卷前有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御制序、喇沙里等人刊毕进呈疏及57位编纂官职名。满文四书以解义形式刊布，其体裁已备，为日后各种版本提供了翻译基础。

查阅刊布的满文图书目录，康熙朝也有坊刻本满文四书存世。大连图书馆藏有《新刻满汉字四书》，该本为听松楼刻玉树堂印本，5册，满汉合璧，线装，左右双边，上下单边，黑口，单鱼尾，书口有汉文章节名称、页码。每页双栏，上栏刻满文，下栏刻汉文，满文书写方式跟随汉文自右向左书写。半页10行，卷前有康熙三十年（1691年）序，云：“现今八旗复行科目，添设义学，无论老幼必以四书为第。满汉各为一本，若于诵读者未能有全美之妙，是用偶抒一得，将满汉正文俱本内颁四书字样合为一编，以便对读。”该本满文的书写方式遵照了汉文的次序自右向左排序。由此可见当时汉文化的主导地位，影响了满文文字的书写方向，而在此之后刊刻的满文四书中再无此例。

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命大学士鄂尔泰对四书的满文译文重加厘定，并交武英殿刊刻，形成乾隆六年（1741年）武英殿刻本《御制翻译四书》。该本为满文本，6卷6册，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有满文书名，汉文页码，半页7行，卷前有乾隆六年御制序。北京故宫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有藏。

虽然四书已经有满文本，但是随着乾隆十二年（1747年）新清语的推广，过去的译文就显得不那么严谨，所用词汇也跟不上满文的变化，需要重新翻译。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上谕档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初二日内阁奉上传， “……现在军机大臣等逐日有进呈翻译五经四书。”说明最迟在乾隆十六年，四书五经的翻译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其成果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武英殿刻满汉合璧本《御制翻译四书》。该本6卷

6册，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处依次有汉文四书名、汉文页码。半页14行，满汉文各7行，满汉文间隔自左向右书写，卷前有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制序。

乾隆皇帝御批的满文四书便是乾隆二十年殿刻满汉合璧本四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稿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全宗满文档案中就收藏着这部分御笔批阅稿本。该本共40件，折件式，满汉合璧，无年代信息，每面6行，满汉文各3行，满汉文间隔自左向右书写，页面高27.9厘米，宽12.7厘米。满文译文部分贴有修改意见的黄签，还有皇帝朱笔批改的笔迹，部分修改文字的上方贴有黄色浮签，其内容为译文修改的依据或原因。其中有《御制翻译四书序》一件，未注明时间，但与乾隆二十年刻本的序相同。

御批稿本集多个版本信息于一身。墨笔书写在折子上的，是满文四书的康熙朝译文，粘贴了黄色纸签的是大臣们修改之后的稿本，朱墨修改之后的便是御批稿本了。

稿本针对音译汉语借词的修改尤为突出。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亲自规范满语并颁发上谕加以推广，这就是“钦定新清语”。清入关之后，满语全面浸润在汉语语言环境中，在使用满语的时候不得不借用汉语词汇，引入的汉语词汇大多音译或翻译的五花八门。“钦定新清”的修订终其乾隆一朝不曾间断。

举例：“论语”满文原词luwen ioi，黄签：钦定成语leolen gisuren；“子”满文原词kungdzi，黄签：钦定四书fudzi；“诗（经）”，满文原词si，黄签：钦定四书irgebun i nomun。以上各词有的是音译改为意译，有的将称谓改为尊称。这些修改的词语，多以“钦定清语”为依据。译文修订稿中随处可见写有“钦定”字样的黄签。《论语·第一分》共13扣，有22处黄签写有“钦定”、“钦定成语”。

对于满文四书的御批，正如御制序言中所说：“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浅深，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然抑扬虚实之间，其别甚微，苟不能按节揣称，求合于毫芒，而尽祛其疑似，于人心终有未谦然者，几暇玩索，覆检旧编，则文义



乾隆帝写字像

意旨语气之未能吻合者，仍不免焉，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考寻译，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

满文版本之典范 传承文明之载体

皇帝御批定稿的满汉合璧四书经武英殿刊刻成书，其版本特征体现了清中期满文刻本图书的最典型特征。各地书坊参照殿本纷纷翻刻刷印，使其在民间广泛流传。乾隆二十年三槐堂刻本、乾隆二十年二酉堂刻本、道光二十七年（1837年）广州驻防官学刻本、光绪四年（1878年）成都驻防八旗官学刻本、宝名堂刻本、京都文光堂刻本、京都名贵堂刻本、京都圣经博古堂刻本都是书肆翻刻本。乾隆二十年保翠斋刻本，在满汉文的基础上增加蒙文译文，形成满蒙汉合璧本。

满族作为清代统治阶层，统治的是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汉族为主要民族的区域，充分了解和理解汉文化对于统治者无疑是很重要的。把汉文著作翻译成满文，无疑是了解和理解汉文化的重要途径。乾隆皇帝本人精通满、蒙、汉、藏、维五种语言，在编修图书上显示了非凡的气魄。在位期间，他充分利用各种优越条件，整理古籍、编纂新书。从校刻、整理到编修本朝史事、翻译汉文典籍等，其种类繁多，卷帙浩繁都超过了他的先辈。重要的书稿都是他命儒臣进呈亲自批阅的。除四书之外，五经、佛经等都有御批稿本留存，为我们了解乾隆时期汉文著作的翻译提供了宝贵资料。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责任编辑：李新宇